

FDI 的就业质量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刘 玉, 孙文远

(南京审计学院 经济与贸易学院, 江苏 南京 211815)

[摘 要] 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一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就业机会的增加,在增加就业数量的同时,也会对就业质量产生重要的影响。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 FDI 对我国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就全国层面角度而言,FDI 显著提高了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就我国不同地区层面而言,东中西部地区在参与 FDI 的过程中,FDI 对于就业质量的影响方向一致,但是呈现东中西部逐渐减弱的态势。在此研究的基础上还验证了 FDI 对于就业质量的影响呈现“N”型曲线特征,且当前 FDI 的进入对于我国就业质量的影响处于“N”型曲线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转换阶段。

[关键词] FDI; 就业质量; 劳动力市场; 外商直接投资; 技术溢出; 劳资关系

[中图分类号] F2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833(2014)06-0103-08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快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得到进一步推进。减员增效、竞争加剧、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人口老年化等因素的出现,给国内各阶层劳动者带来了巨大且复杂的影响。就业的稳定性、持续性、可预期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改变,从而给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带来了相应的影响。国家“十二五”规划指出,提高就业质量,让劳动者体面就业;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在新时期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就业质量是衡量劳动者在整个就业过程中就业状况的综合性指标。Schroeder 从工作特征视角对此进行了界定,认为就业质量涵盖劳动者的工作效率、职位匹配程度、薪酬水平等微观因素^[1]。国际劳工组织(ILO)在 1999 年的大会上,用“体面劳动”对此进行界定,即“促进男女在自由、公平、安全和具备人格尊严的条件下获得体面的、生产性的可持续工作机会”,其特征主要包括就业机会、合理的工作时间、足够的收入、安全的工作环境、工作的稳定性、工作与家庭生活的平衡、社会保障、社会对话和劳动关系、就业公平、不可接受的工作、经济和社会因素 11 个方面^[2]。欧洲基金会将就业质量的评价总结为职业和就业安全、健康和福利、技术发展和工作与非工作生活的和谐四个方面^[3]。Bastelaer 则从劳动力市场的视角,认为就业质量是劳动力市场运行状况及资源配置效率的反应,它包括劳动力供求状况、公共就业服务质量等^[4]。

国内也有不少学者针对就业质量进行了多方面的解读和研究。刘素华从个体的就业质量和宏观的就业质量视角对就业的概念、内容及其对就业数量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研究^[5]。张桂宁针对就业质量这个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通过对就业质量内涵以及劳资关系与劳资冲突的分析,着重从劳方、资方、政府这三个方面论证了劳资关系对就业质量的影响^[6]。赖德胜等应用了统计分析方法,针对我国各地区就业质量进行了测算与评价^[7];苏丽锋从宏观角度出发,研究了地区就业质量的影响因

[收稿日期] 2014-04-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CJL033);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应用经济学);江苏省“十二五”重点(培育)学科资助项目(理论经济学);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科技创新团队项目(价值链分工的经济效应)

[作者简介] 刘玉(1974—),男,江西九江人,南京审计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讲师,从事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孙文远(1970—),男,江苏兴化人,南京审计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从事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

素^[8];米子川则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对国民就业质量的评价进行了研究^[9];还有学者针对就业质量与就业数量的关系、就业质量与经济增长等角度进行了分析^[10]。近年来,市场中一个特殊的就业群体(大学生)的就业质量问题也得到了研究者的重点关注^[11-13]。

在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受到重视的一个因素就是 FDI。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的规模越来越大,对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学者担心,随着外资的大量进入,其有可能会导致中国参与外资企业的劳动力技能“低级固化”。刘素华等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对外资的强烈需求,强化了资本的强势地位,使得劳动者地位总体上在下降,另外,由于我国以低层次、低利润行业参与全球分工,也制约了劳动者工资福利的提高^[14],因此他们认为,总体上来说,外资不利于本国就业质量的提高。

更多的学者在有关 FDI 的就业质量效应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相对积极。如谢光亚、陈春霞针对外资进入北京文教体育卫生行业进行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员工进行的职业培训,加上企业内部员工的“边干边学”,推动了企业劳动力生产技术、经营管理水平以及创新研发能力的有效提升,从而提高了北京市劳动力的从业能力^[15]。其他学者从多个不同的侧面对 FDI 与中国工人工资水平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如:基于企业层面的角度、针对珠三角的研究以及从中国城市工资水平的角度)^[16-18]。

根据已有的国内外文献发现,因为不同作者的研究目的存在差异、具体研究使用模型和数据不同,其结论也呈现多样性。但是我们仍然发现,多数研究表明,参与 FDI 的过程对于就业质量的提高往往都有一个积极的作用。

本文的研究试图回答如下问题:外商直接投资能否提高我国的就业质量?考虑到中国巨大的地区差异、城乡二元经济特征以及中国东中西部参与 FDI 的不同,研究 FDI 对于不同地区的就业质量提升程度是否也有差异?本文的总体思路是:首先分析中国参与 FDI 和就业质量的现状,研究 FDI 对于就业质量影响的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收集各省市 FDI、测算就业质量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得到 FDI 对于就业质量的具体影响效应,然后提出结论和可能的启示。下文的具体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关于中国参与 FDI 的经验事实和就业质量的测算;第三部分是对 FDI 影响就业质量的相关理论分析、数据说明和计量模型的建立;第四部分为计量的回归结果及其解释;第五部分是相关结论和启示。

二、中国的经验事实

(一) 中国参与 FDI 的进程:数量大、增速快、不均衡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生产一体化进程加快,我国企业积极主动的“走出去”,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分工。同时,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入我国。1979—1984 年期间,我国共吸引了 41.04 亿美元的外资,且随着我国的进一步开放,FDI 还在逐年增加。具体来说,1985—1992 年,FDI 增长的幅度相对较缓,但从 1992 年后,增值幅度有所加快,中国吸引的 FDI 值从 1985 年的 19.56 亿美元增长到 2012 年的 1117.16 亿美元,增长了 57.11 倍(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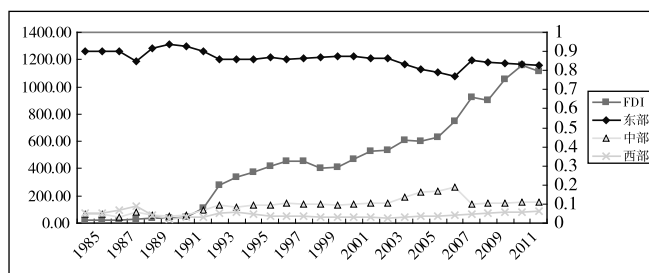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历年实际 FDI (单位:亿美元) 和东中西部占比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地统计年鉴。

从历年各地区实际吸收 FDI 的数据分析可知,地区间差异较大,发展不均衡。东部地区一直居高不下,2006 年和 2007 年占比在 80% 附近,部分年份甚至达到 90%,而中西部地区占比较小,西部地区也只有在 1989 年之前超过中部地区,之后就一直落后于中部,基本一直在 10% 以下。从 2012 年度数据来看,其中吸引外资最多的地区为江苏,达到 1182.3635 亿美元,占全国 2012 年所有外商直接投资额的 26%,超过第二名广东省 572.1656 亿美元和第三名山东省 405.7171 亿美元的总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最多的行业为制造业,数值为488.66亿美元。从FDI来源地的角度来看,除了香港的655.61亿美元之外,最多的来源地区为日本,其值为73.52亿美元,其次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二、就业质量的测算与现实

在对就业质量进行实证分析时,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指标和指标体系来对就业质量进行测度。具体来说,它包括工作质量指数、就业稳定性指数、就业地位指数、福利和保障指数、职业发展指数、健康和安生指数、工作的可获得性指数等指标。在具体测算和度量时,学者们可以根据上述各类指数计算平均指标,用来反映某一个群体的平均水平,或以该平均指标为基础,根据人们对上述问题的重视程度确定各项指数的权重,并进行加权。这样处理即可计算出就业质量指数,又可概括地反映就业质量的优劣。

图2是我国分地区的就业质量指数。从图2可以看到,就业质量指数一直处于上升状态,虽然2004年和2005年进入一个平缓过渡期,但2006年后继续呈现增长趋势,显示我国的就业质量不断改善。东部地区的平均就业质量指数最高,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质最指数各有千秋,但在2006年后,都呈现加速上扬态势,充分显示随着我国国民经的发展,城乡差异、行业差异和所有制差异正在逐步被打破,限制劳动力流动的门槛逐渐降低,就业的质量逐步得到了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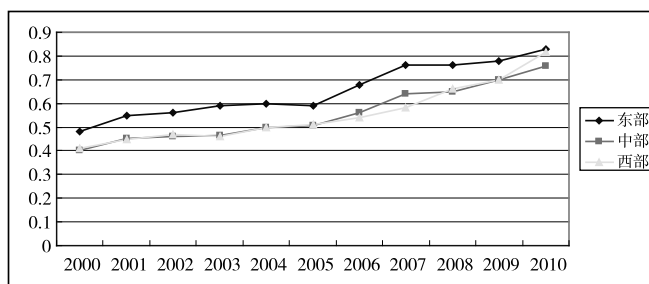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分地区的就业质量指数(2000—2010)

资料来源:根据苏丽锋(2013)数据整理。

从分省数据来看,北京、上海、江苏等发达地区一直处于就业质量指数最高的行列,这些地区也是综合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而广西、贵州等地区相对较低,当地的经济发发展水平低,工资水平低,就业机会相对较少,就业效率差,工作安全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劳动力主要流向东部沿海地区。这一系列的差异也显示了就业质量仍然存在地区性差异。

三、FDI影响就业质量的机制

FDI对于就业质量的影响可能有这样一些原因:FDI增加了社会投资,扩大了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且FDI技术要求比较高,实际上也就增加了对于高技术劳动力的需求;FDI的引入会使国内企业从外资的技术溢出中获得收益,从而提高本国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劳动力也会在就业过程中,提高自身教育水平,增加获得高质量就业的机会。其具体影响机制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FDI对于劳动力需求的偏好。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往往都是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企业,其需求的劳动力素质较高,提供的就业环境较好、工资待遇较高,劳动者就业质量较高。跨国公司对我国进行直接投资时,倾向于“五高”行业,即劳动生产率、利润率、资本密集度、生产集中度和人均工资水平较高的行业,这样会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FDI的进入也会提升东道国的技术水平,使得东道国企业参与全球分工,从而使劳动密集型加工行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发展,进而相应地扩大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改善了东道国就业质量^[19]。

第二,FDI的技术溢出和竞争效应。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主要包括竞争与合作效应、人力资本外溢和示范效应、技术运用和市场开拓效应等几个方面,其中人力资本外溢效应促进了就业质量的提高,其他几种外溢效应也都隐含着对劳动力技能提高有促进作用^[20]。按照哈佛大学波特教授的观点,FDI的进入加剧了当地企业间的资源竞争,也促进了本地企业的开放,使得竞争由国内转向了国际市场,提高了一国的出口开放程度,促进了就业数量的增加和就业质量的改善^[21]。朗讯、阿尔卡特

等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电信行业,促进了电信行业的竞争,提高了相关企业的就业质量。

第三,FDI 的产业集聚效应与劳动力流动效应。产业集聚往往会产生高度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性。而 FDI 的进入,往往在同一地区形成集聚效应,如昆山的台资集聚,烟台的韩资集聚,东莞的港资集聚,它们都在当地形成了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很好地促进了高级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当前,我国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和地区市场分割,劳动力流动成本仍然相对较高,当外资企业进入时,除非他们工资水平大大高于国内企业,否则很难雇佣到高技术工人,因此 FDI 的进入很好地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在外资企业中的就业人员工资呈现螺旋式上升,使得就业环境得到改善,就业质量得到提升。

第四,FDI 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体现就业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信号,就是就业的工资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员工往往都能够获得较高的工资待遇。获得高工资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要求具有较高的技能水平,而要获得较好的技能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教育。外企中熟练劳动力的较高工资报酬信号具有显示功能和预期效应。每个参与工作的劳动者基于预期收益的增加,其个人的教育决策会受到预期收益的影响。因此,随着参与全球化分工企业员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在一定时间后,劳动者的教育支出必定增加,教育支出的增加反过来促进就业质量的提高。政府为了吸引企业参与全球分工,吸引海外直接投资,必定要加大教育投入,以适应参与全球分工对于劳动力技能的要求^[22]。另外,FDI 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某种程度上可能会促成发展中国家的“智力回流”,遏制了“智力外流”现象,并且 FDI 与东道国人力资本往往具有良性互动关系,FDI 通过影响东道国的正规教育和在职培训提升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

四、FDI 对于就业质量的影响:实证检验

(一) 检验模型的确定与变量描述

为了实证分析 FDI 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我们将代表各地区就业质量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将 FDI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考虑到要素禀赋的基础作用,我们选择各地区的资本和人力资本等要素拥有量作为主要的控制变量。此外,根据其他学者研究,我们估计 FDI 与就业质量之间可能存在某种非线性关系,因此,在估计模型中加入了 FDI 与人力资本的交叉项,以考察 FDI 通过人力资本的途径可能对就业质量产生的影响。在实证分析时,考虑到就业质量效应的累积效应,我们加入就业质量变量的滞后一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以考察其动态效果。

借鉴 Amiti 和 Wei 研究模型^[23],我们将检验模型设定为:

$$eq_{i,t} = c + \alpha \times eq_{i,t-1} + \beta fdi_{i,t} + \gamma fdi_{i,t} \times human_{i,t} + \phi Z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eq_{i,t}$ 为各地区就业质量指数。

(二)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我们将代表各地区就业质量指数($eq_{i,t}$) 作为被解释变量。就业质量指数是根据 2013 年苏丽锋的研究内容和《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 2011》整理而得^[8]。

2. 解释变量

对于 FDI 而言,考虑到被解释变量为相对指数,解释变量选用相对数来进行可能更为合理。我们用各省市 FDI 金额占当年 GDP 比重来衡量各省市 FDI 的程度。数据来源于国研网统计数据和各地历年统计年鉴。

对于人力资本($human$)的计量,学者们一般采用两种计量方法:一是采用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来计量;二是采用产出法来进行计量,即用人力资本投资后产生的价值来估算人力资本价值。为了方便,本文采用各省市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该省市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各省市的人力资本水平。

Z 为控制变量,它主要包括各地区的要素禀赋变量,在本研究中,我们主要考虑资本要素和人力资本等控制变量。

资本要素(*capital*)用各地区去掉 FDI 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

在运用以上变量进行估计时,本文所有的变量均取了自然对数,因此变量前的估计系数也可以看作是弹性系数。

表 1 FDI 对于地区就业质量的影响

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数据来源
<i>eq</i>	就业质量指数	用各省市就业质量指数表示,将 $\ln(1 + eq)$ 引入模型	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 2011;2013 年苏丽锋发表的论文
<i>fdi</i>	FDI	用各省市 FDI 占 GDP 的比重来代替,将 $\ln(1 + fdi)$ 引入模型	国研网统计数据库及各地统计年鉴
<i>human</i>	人力资本	用各省市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将 $\ln(1 + human)$ 引入模型	中国统计年鉴及各地统计年鉴
<i>capital</i>	资本	用各省市剔除 FDI 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比例来衡量,将 $\ln(1 + capital)$ 引入模型	中国统计年鉴及各地统计年鉴

在实证分析中,为了分析 FDI 对不同地区就业质量的差异,我们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等综合指标视角,将我国大陆的省市自治区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山东、辽宁、河北、福建、广东、广西、海南,总共 12 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湖南、湖北、内蒙古、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总共 9 个省区;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陕西、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总共 10 个省市。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要求,本文在实际研究中将西藏剔除,这样选定的地区共 30 个。我们将考察时期定为 2000—2010 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2。

(三) 检验结果分析

表 2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2000—2010 年)

变量	观察值个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eq</i>	330	0.593	0.171	0.273	1.579
<i>fdi</i>	330	0.2196	0.0947	0.0198	0.6925
<i>human</i>	330	0.0708	0.0812	0.0079	0.3125
<i>capital</i>	330	0.4803	0.0962	0.2676	0.8677

数据来源:IMF BANK 数据、国研网统计数据、各地统计年鉴。

在分析 FDI 对就业影响的基础上,我们使用了就业质量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由于主要分析的是我国大陆 30 个地区的 FDI 对于就业质量的影响,因此本文选择了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实证分析主要包括基于全国面板数据和基于东中西部地区数据两个层面的分析。

表 3 是基于全国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在通过逐步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中,我们发现,FDI 对于就业质量的影响在统计分析上显著为正,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 FDI 对于提高我国各省区就业质量确实有积极的效应,二是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以模型 4 为例,FDI 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系数估计值为 0.982,说明 FDI 程度变化每增加 1%,当年就业质量平均增加 0.982%。因此,在全国层次上,FDI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各地区就业质量。有关就业质量的滞后变量的计量分析也表明,FDI 与当期就业质量指数正相关,显示了就业质量效应具有一定的惯性。

表 3 FDI 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基于全国层面的分析(2000—2010 年)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C	0.194 *** (0.798)	0.543 ** (0.883)	0.376 * (1.103)	0.702 (1.201)
eq_{t-1}	1.234 ** (0.517)	1.159 * (0.406)	1.322 *** (0.599)	1.193 *** (0.494)
fdi	1.544 ** (0.553)	1.721 ** (0.421)	1.661 *** (0.704)	0.982 ** (0.551)
$capital$		1.0421 ** (0.119)	0.783 ** (0.252)	0.901 *** (0.381)
$Human$		1.009 *** (0.814)	1.318 ** (0.452)	1.317 ** (0.668)
$fdi * Human$				0.792 *** (0.443)
AR^2	0.713	0.668	0.702	0.808
F	101.33 ***	115.62 ***	116.71 ***	122.21 ***
$DW\ stat$	1.452	1.473	1.6324	1.611
obs	330	330	330	330

注:统计软件为 Eviews6.0;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下同)。

在控制变量分析中,资本增加能够提高就业质量,这是因为资本的增加,引起劳动力需求的增加,

从而提高就业质量。投资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客观上能够提高就业质量。人力资本变量的回归系数显示,其对就业质量的提高具有一定的促进效应。彭国胜基于长沙市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实证调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与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关系,其实证研究结果还表明,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偏低,且受人力资本的显著影响,人力资本在获得较高工资方面发挥主要作用,学历越高就业质量也越高,这是一个基本规律^[24]。

在模型 4 中,我们还考察了 FDI 与人力资本的联合作用,发现 FDI 能通过人力资本的作用提高就业质量。

在 FDI 迅速向我国转移和集聚的背景下,包括东、中、西部各地区的劳动力也更加集中于东部地区,因此,考虑到东中西部吸引 FDI 和劳动力要素等资源的巨大差异,FDI 对于就业质量的影响在地区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下文我们将依次从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以考察地区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

表 4 是采用面板数据针对分地区的回归分析结果。估计结果表明,FDI 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区域性差异。具体来说,东中西部参与 FDI 有助于提高就业质量,且呈现出东部影响较大、中西部次之的现象。这一方面体现出东部、中部和西部融入国际分工网络和参与全球分工的不同层次和水平;另一方面可能是经济发展相对成熟的地区市场机制较强,FDI 对于就业市场的传导效果更好,因此影响效果更明显。

表 4 FDI 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基于地区层面的分析(2000—2010 年)

	东部		中部		西部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i>C</i>	0.818 * (0.697)	0.114 (0.602)	0.573 ** (0.702)	0.141 ** (0.393)	0.789 ** (0.541)	0.386 * (0.793)
<i>eq_{t-1}</i>	1.113 ** (0.538)	1.405 ** (0.631)	1.219 ** (0.427)	1.305 ** (0.588)	1.007 *** (0.482)	1.024 ** (0.419)
<i>fdi</i>	1.887 *** (0.537)	1.483 ** (0.507)	1.341 *** (0.786)	1.212 *** (0.499)	1.109 ** (0.589)	1.099 *** (0.496)
<i>capital</i>	1.496 ** (0.313)	1.813 ** (0.223)	1.113 ** (0.227)	1.091 *** (0.211)	1.087 *** (0.274)	1.701 *** (0.22)
<i>Human</i>	1.078 ** (0.304)	1.358 *** (0.444)	1.006 *** (0.313)	1.154 *** (0.561)	1.301 *** (0.573)	1.214 *** (0.631)
<i>fdi * Human</i>		1.432 ** (0.229)		1.412 *** (0.395)		1.122 *** (0.304)
<i>AR²</i>	0.688	0.714	0.738	0.802	0.796	0.811
<i>F</i>	68.03 ***	54.29 ***	111.02 ***	122.01 ***	138.32 ***	99.09 ***
<i>DW stat</i>	1.460	1.501	1.475	1.591	1.496	1.619
<i>obs</i>	132	132	99	99	99	99

此外,计量结果还表明,就业质量指数的滞后变量对就业质量始终存在正的影响且在统计上显著,这说明:就业质量具有自我强化机制,意味着随着就业环境的改善,就业质量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与 FDI 相匹配的人力资本对就业质量的提高在东中西部地区都有显著效应,具体而言,在东部地区,FDI 通过人力资本显著提高就业质量,而在西部和中部地区次之。

五、FDI 影响就业质量的类型检验

在研究中,我们试图分析 FDI 与就业质量之间的某种非线性关系。类似的研究,如 Knight 和 Sabot 对于教育水平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研究发现,FDI 与就业质量之间存在着“库兹涅茨假说”的倒“U”型关系^[25]。为了检验 FDI 与就业质量间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关系,以及 FDI 影响就业质量效应的类型,我们建立如下计量模型^①:

① 笔者试图通过其他模型来检验 FDI 与就业质量之间是否服从其他类型,如通过 $eq_{i,t} = \alpha + \beta_1 fdi_{i,t} + \beta_2 fdi_{i,t}^2 + \varepsilon_{i,t}$, 检验是否服从“U”型或倒“U”型,若估计结果 $\beta_2 > 0$,则符合“U”型假说,若 $\beta_2 < 0$,则符合倒“U”型假说。

$$eq_{i,t} = \alpha + \beta_1 fdi_{i,t} + \beta_2 fdi_{i,t}^2 + \beta_3 fdi_{i,t}^3 + \varepsilon_{i,t} \quad (2)$$

(2) 式用来检验 FDI 对就业质量效应影响的类型。根据(2) 式的估计结果,若估计结果 $\beta_1 > 0$ 、 $\beta_2 < 0$ 且 $\beta_3 > 0$,则曲线呈“N”型,反之,如果 $\beta_1 < 0$ 、 $\beta_2 > 0$ 且 $\beta_3 < 0$,则为倒“N”型曲线。

表 5 给出了针对 FDI 对于就业质量影响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分别列出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两种模型的结果,从实证分析来看,Hausman 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来解释实证的结果较为合适。

由表 5 模型 11 的估计结果发现, $\beta_1 > 0$ 、 $\beta_2 < 0$ 且 $\beta_3 > 0$,通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检验,即估计结果支持“N”型假说。因此,FDI 的就业质量效应符合“N”型假说,即随着 FDI 程度的不断提高,FDI 对就业质量效应的贡献程度呈现出先递增后递减的态势,但是,总体上仍然是促进了就业质量的提高。

为了直观地反映 FDI 对于就业质量影响的“N”型曲线变化形态,根据表 5 模型 11 的估计结果,我们得到 FDI 就业质量效应的方程:

$$eq_{i,t} = 0.146 + 6.77fdi - 8.39fdi^2 + 3.15fdi^3 \quad (3)$$

图 3 为方程(3)的显示图。图 3 画出两个特殊点 E(0.62, 1.86), F(1.55, 1.62), 其中, E、F 是区域极值点。E、F 点把“N”型曲线分成左中右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E 左边的曲线,这一阶段,FDI 的就业质量效应是递增的,表示随 FDI 程度的提高,其对就业质量的影响越来越高。第二部分是 EF 之间的曲线,这一阶段 FDI 的就业质量效应是递减的,表示在达到区域高峰 E 点之后,随着 FDI 程度的加深,其对于就业质量的影响逐渐减弱;在 F 点右边部分显示,随着 FDI 的进一步引进与加强,其对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仍然会提高。

通过图 3 有关 FDI 的就业质量效应,可以发现,当前我国的 FDI 的就业质量效应处于“N”型曲线的第一部分向第二部分转换的阶段,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其他原因,随着 FDI 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就业质量仍然会进一步改善,但是改善的程度将呈现递减趋势,不过,在经过某个临界点之后,又会进一步加速提高就业质量。因此,从就业质量提高的角度来看,中国仍然需要进一步大力引进 FDI。

六、结论、启示与政策建议

我们选取我国大陆 30 个省市自治区作为考察对象,采用了 2000—2010 年面板数据,就 FDI 对地区内就业质量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

结果显示,FDI 提高就业质量,从短期来看,其促进就业质量增加的速度呈现加速状态,而中期有走弱的趋势,但从长期来看,FDI 对于就业质量的影响将趋于提高。通过对不同地区的考察发现,FDI 对我国各省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区域性差异,其影响程度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呈现出依次衰减的趋势。人力资本对于就业质量的影响具有积极贡献,且 FDI 通过人力资本提高就业质量,另外,资本对于就业质量作用也很大。在实证分析中,我们还发现,就业质量具有自我强化机制。

FDI 对于就业质量的影响呈现“N”型,且目前该影响处于“N”型曲线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的转换阶段。在短时间内,随着各地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参与 FDI 的进程加快,就业质量的提高幅度会有所下降,

表 5 FDI 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类型

	模型 11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C	0.146 * (1.119)	0.294 (1.098)
fdi	6.77 * (0.681)	3.37 ** (0.717)
fdi ²	-8.39 * (0.583)	-1.86 ** (0.348)
fdi ³	3.15 * (0.583)	6.51 ** (0.348)
AR ²	0.84	0.73
F	122.251	73.721 *
DW stat	1.573	1.392
Hausman 检验值 (P 值)	13.093 (0.1498)	
Observations	330	3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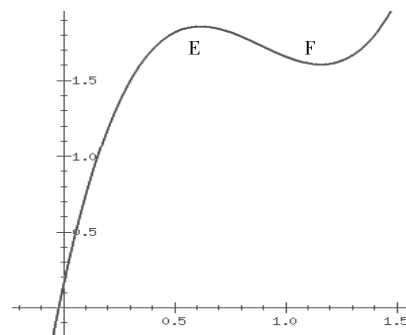


图 3 FDI 的就业质量效应

但是到了某一临界值之后,FDI 对于就业质量的贡献会进一步加速提高。因此,从就业质量提高的角度来看,各地需要进一步大力引进 FDI。基于全国层面分析表明,在引进 FDI 时,政府需要关注 FDI 所引起的区域差异。FDI 是我国就业质量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大量 FDI 的进入意味着就业质量的改善。

参考文献:

- [1] Schroeder F K. Braille usage: perspectives of legally blind adul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school administrators[D].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1994.
- [2] ILO. Decent work, report of the director general [R]. Deneva, 1999.
- [3]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Annual review of working conditions in the EU: 2003—2004 [EB/OL]. <http://www.eurofound.eu.int> [2004-05-06].
- [4] Bastelaer V. A dimension of job quality: data from the adhocmodule of the 2001 labour force survey in the EU [R]. Work Organization, 2002.
- [5] 刘素华. 就业质量:概念、内容及其对就业数量的影响[J]. 人口与计划生育 2005(7):29-31.
- [6] 张桂宁. 论劳资关系对就业质量的影响[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7):127-129.
- [7] 赖德胜,苏丽锋,孟大虎,李长安. 中国各地区就业质量测算与评价[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1(11):88-99.
- [8] 苏丽锋. 我国转型期各地就业质量的测算与决定机制研究[J]. 经济科学, 2013(4):41-53.
- [9] 米子川. 国民就业质量评价的国际比较[J]. 中国国情国力, 2012(2):36-38.
- [10] 田晓青,王晓倩. 包容性增长下的就业质量研讨会综述[J]. 经济学动态, 2012(2):159-160.
- [11] 秦建国. 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探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07(3):71-74.
- [12] 石彤,王献蜜. 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09(6):68-73.
- [13] 史淑桃. 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专业差异的比较研究[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0(1):77-79.
- [14] 刘素华,韩春民,王龙. 全球化对我国就业质量的影响机理及走势透析[J]. 人口与经济, 2007(02):30-34.
- [15] 谢光亚,陈春霞. 利用外资对北京市就业的贡献[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2005(5):45-50.
- [16] 胡立君,郑玉. 知识产权保护、FDI 技术溢出与企业创新绩效[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4(5):105-112.
- [17] 李雪辉,许罗丹. FDI 对外资集中地区工资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J]. 南开经济研究, 2002(2):35-39.
- [18] Ying G. The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urban wage[R].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Urban Studies, 2006.
- [19] 邱晓明. 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变迁分析[J]. 中国软科学, 2004(3):55-58.
- [20] 江小娟. 理解科技全球化[J]. 管理世界, 2004(6):4-13.
- [21] Wright P W, Milner C. Modelling labour market adjustment to trade liberalisation in an industrialising economy[J]. Economic Journal, 1998, 108(12):305-311.
- [22] 张二震,任志成. FDI 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一个文献综述[J]. 南京社会科学, 2007(11):1-6.
- [23] Amiti M, Wei S. Services outsourcing, production and 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the US[R]. IMF Working Paper, 2004.
- [24] 彭国胜. 人力资本与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基于长沙市的实证调查[J]. 湖北社会科学, 2009(10):102-105.
- [25] Knight J B, Sabot R H. Educational expansion and the kuznets effec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3, 73(3):14-19.

[责任编辑:杨志辉]

On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 on Employment Quality

LIU Yu, SUN Wenyuan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Abstract: FDI has a strong impact on Chinese economy. It has even led to the transition of Chinese econom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research on China employment quality should be attached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e of FDI on Chinese economy. The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research by using the employment data from 2000 to 2010, the result discovers that FDI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employment. Further, it finds that the existence of FDI in east, central, west regions presents a different influence.

Key Words: FDI; employment quality; labor market; technical overkills; employment effect